



南开经济史丛书

跨国公司与 墨西哥的经济发展

UAGUO GONGSI YU MOXIGE DE JINGJI FAZHAN

韩琦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跨国公司与墨西哥的经济发展

(20 世纪 40 年代至 80 年代初)

韩 琦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陈寒节

责任校对:湖 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国公司与墨西哥的经济发展/韩琦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

(南开经济史丛书/王玉茹主编)

ISBN 978-7-01-009558-5

I. ①跨… II. ①韩… III. ①跨国公司-影响-经济发展
-研究-墨西哥 IV. ①F17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7834 号

跨国公司与墨西哥的经济发展

(20 世纪 40 年代至 80 年代初)

KUAGUO GONGSI YU MOXIGE DE JINGJI FAZHAN

韩 琦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6.25

字数:377 千字 印数:0,001-2,500 册

ISBN 978-7-01-009558-5 定价:50.00 元

邮购地址: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南开经济史丛书》编委会

顾 问：吴承明

总 序

南开大学的经济史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国内外经济史学领域享有盛誉。1927 年南开大学成立经济研究所,该所创始人何廉先生发表《三十年来天津外汇指数及循环》,首创用经济学理论和计量学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史的范例。何廉在建所之初就请他在美国的好友方显廷主持该所的研究工作。方显廷在耶鲁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经济史研究的力作《英国工厂制度之胜利》。他来南开后,以近代工业发展为主,在经济研究所建立了多种研究项目。各地有志之士闻风来归,人才济济,成果累累。到 1937 年共出版经济史专著 45 种。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作为中国最早连续培养硕士研究生的科研机构,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招收研究生,在招生专业中经济史就列入其中。新中国成立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和经济学系分别设有经济史研究室和经济史教研室。以傅筑夫先生为首的南开大学经济史学科成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阵地。20 世纪 80 年代初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后,南开大学是全国高校理论经济学科最早获得经济史博士学位授予权的两个单位之一(另一个为北京大学)。2001 年在全国重点学科评估中,南开大学经济史学科被确定为理论经济学科中全国唯一的经济史国家级重点学科。

20 世纪 60 年代南开大学与企业合作,整理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范旭东企业集团(永利、久大)的历史资料;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开始,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共同承担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等重大项目的研究。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以

刘佛丁教授为首构建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新框架,形成了南开大学经济史研究的特色,承担和完成了数十项国家和省部级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在国内外经济史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发展,目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和历史学院形成了一支实力较强的经济史研究和教学队伍,研究的主要领域包括:中国近代宏观经济的增长与发展、企业史、财政史、金融史、农村和区域经济发展、外国经济史(日本经济史、拉美经济史、美国经济史等)、比较经济发展等。为了更好的整合南开大学经济史学科资源,2005年南开大学成立了经济史研究中心,由王玉茹教授任研究中心主任。

为了促进学科的发展,南开学人决定出版《南开经济史丛书》。这套丛书的出版,旨在展示南开大学经济史学研究的新进展;弘扬南开经济史学科的特色;推出新人新作;促进经济史学的交流与繁荣。《南开经济史丛书》编辑部设在南开经济史研究中心,将在“十一五”期间推出第一批10部专著,以后继续分批出版。

我不是南开学人,而是受托写此序言。我欣然命笔,并衷心祝贺《南开经济史丛书》顺利出版。

吴承明

2007年5月于北京蓝旗营

序 言

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长期国策,将贯穿我国的整个发展过程。毋庸讳言,对外开放是一个机遇和风险并存的过程,中国与西方跨国公司之间始终是一种既相互合作又相互较量的关系。这种合作与较量的内容和方式也将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加强对跨国公司的研究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的、长期的使命。

拉美国家与西方跨国公司打交道的历史要比中国长得多,特别是像墨西哥这样的拉美大国,历来都颇受西方跨国公司的青睐。自19世纪后半期墨西哥进入国家现代化发展阶段以来,西方跨国公司一直在墨西哥的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历届墨西哥政府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合作与较量几乎构成了一部情节曲折、攻守转换、高潮迭起、有声有色的长篇历史剧。《跨国公司与墨西哥的经济发展》就是专门研究这一历史长篇的一部力作,这也是国内第一本系统论述拉美国家跨国公司问题的专著,相信其能为广大读者打开一扇知识之窗,并提供有益的历史启示。

该书的作者韩琦教授任职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和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从事拉美史的教学与研究,特别是以其历史学功底和经济学功底兼备的专业素养,在拉美经济史研究领域长期耕耘,积淀深厚,是国内拉美学界一位颇具影响力的中年学者。关于他的这部新作,我想谈几点初步的体会。

一、关于这本书的前期准备。学术研究历来提倡“厚积薄发”。按我个人的粗浅理解,对于一部学术著作而言,所谓“厚积”有很大一部分就

体现在前期准备上。在与韩琦教授 20 多年的交往中,我对他在这本书的前期准备工作中所付出的辛劳是有所了解的。读者不难发现,这本书所运用的资料数据是相当全面、系统的。如作者所言,墨西哥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相关统计资料往往并不完整,尤其是早期发展阶段的数据更是稀缺难找。因此,作者在搜集资料方面曾经花费了很长的时间和大量的精力,其中包括刻苦学习西班牙文并到墨西哥进行业务进修与实地考察。作者坚持“论从史出”的原则,力求使其自己的论述与判断建立在客观真实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这既是应有的治学态度,但又绝不是可以轻而易举地就能做到的。这本书选取了墨西哥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作为重点考察时段,这个阶段从 20 世纪 40 年代延续到 70 年代,跨度达 40 年。加上对 20 世纪 40 年代以前墨西哥引进西方跨国公司的历史介绍,历史跨度就更长。能把这个漫长历史阶段中墨西哥与跨国公司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及其相关背景条分缕析地呈现给读者,是以前期艰苦的准备与研究为基础的。作者在书中还大量引用了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力求从各种不同观点的比较中得出比较客观的判断,这同样需要有一个前期积累的过程。

二、关于墨西哥的外资政策。作者在书中对墨西哥外资政策的发展演变做了系统的回顾与论述,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与启示。墨西哥曾是一个饱受帝国主义欺凌的国家,光是被外国吞并的领土就占其原有国土面积的一半以上。人们因此曾感叹墨西哥“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但是,有一个现象却令人关注,墨西哥从来没有实行过“闭关锁国”的政策。墨西哥独立后的第 3 年(1823 年)就颁布法令,允许外国人“购地开矿”。在迪亚斯当政时期(1876~1910 年),外资进入墨西哥出现第一个高峰期,到 1910 年前后,墨西哥的主要经济部门均被外国资本所掌握。1910 年爆发的墨西哥革命显然对这种外国资本过度扩张的局面做出了反应,如 1917 年宪法关于国家对地下资源所有权的规定,卡兰萨政府强调增加国家在资源财富中所占的比重,直至 20 世纪 30 年代卡德纳斯政府实行石油国有化,并在土地改革过程中没收了外国公

司占有的大片土地,等等。这可以说是在全面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以前,墨西哥与跨国公司之间的一次重大较量。但即便是在这个所谓民族主义思想高涨的年代,墨西哥的国有化运动也只具有局部的性质,而且后来都通过与跨国公司的谈判,进行了合理的赔偿。

进入20世纪40年代以后,墨西哥经历了持续40年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这是作者重点考察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墨西哥国民经济实现了重大的结构转型,外国资本也全面渗入了墨西哥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部门。作者对这个阶段中墨西哥历届政府外资政策的调整做了系统的描述和分析,清楚地呈现出政策几度放松又几度收紧的变化过程,以及墨西哥与跨国公司之间频繁的攻守转换。从这个过程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两点基本的判断:第一,在上述年代里,墨西哥在对待外国资本或处理与跨国公司关系的决策中,既不存在某种极端的民族主义,也没有出现极端的自由主义。第二,历届政府所实行的外资政策或相对宽松,或相对严厉,都与当时的内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基本出发点都是努力维护本国的正当权益。这种情况恰好说明,在外资政策上,墨西哥政府长期处于在实践中不断进行探索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出现政策上的某些偏差与失误也在所难免。

三、关于“墨西哥化”与“非民族化”。这里所说的“非民族化”是指外国资本对某种产品、某个生产行业、甚至某个经济部门形成控制或独占的局面,使东道国资本边缘化。作者对于20世纪70年代跨国公司在墨西哥众多工业部门所形成的控制或独占局面做了详尽的介绍与论证,其情景有点令人触目惊心!这显然与墨西哥引进外资的初衷相违背。但问题在于,这种“非民族化”局面恰恰是在墨西哥明确提出“墨西哥化”的背景下出现的,这该如何解释呢?我认为,作者在这个问题似乎缺少了一点笔墨,没有对此做一个集中的分析与回答。当然,细心的读者从不同的章节中还是可以找到答案的。例如,政府把“墨西哥化”的重点放在了自然资源和基础设施领域,如采矿、石油、铁路、电力,等等,而此时跨国公司投资的重点正好在向制造业转移,因而双方并无多大冲突。又如,跨国公

司大量采用并购当地工业企业的方式来拓展地盘,而政府和本国私人资本对跨国公司这种策略所蕴涵的风险缺乏防范意识。再如,政府提出的“墨西哥化”方针包含有提倡合资和限制外资股权比例等具体政策内涵。然而,在建立某些新兴产业的过程中,政府至少握有本国市场的优势,本来可以通过合资或规定零部件国产化比例等方式直接参与,但实际上往往没有坚持这样做。如此等等。

四、关于外资政策与国家发展战略的关系。作者在分析墨西哥利用外资的实际成效时,没有局限于单纯从外资政策本身去寻找原因,而是同时把国家发展战略这个大背景纳入分析视野,这是书中的一个重要亮点。在拉美地区,所谓“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内向发展战略从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大萧条发生后逐步成型,一直延续到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爆发为止,长达50年。以墨西哥为例,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这40年的发展始终在这一战略的主导下进行,只不过其中不同的阶段替代进口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由这一战略主导的工业化进程的基本特点是,按工业产品的不同类型实行由低级向高级的逐级替代,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国家对外建立起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对内实行“以农养工”等一系列优惠政策,以保护和支持民族工业的发展。在这个背景下,外国资本就绕开贸易壁垒,以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墨西哥。这样,外资企业不仅享受着与当地企业同样的优惠待遇,而且以其资本雄厚和技术先进等强大优势与当地企业争夺墨西哥这块相对有限的市场,从而也就不断地挤压着当地企业的发展空间。随着墨西哥的工业化逐步从非耐用消费品向耐用消费品等高端产品生产升级,外资企业的固有优势更进一步显现出来,使当地企业在高端产业中的地位更加边缘化。由此可见,当时墨西哥利用外资的实际成效如何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其发展战略(或发展模式)的支配,很难从具体的外资政策中找出完整的答案。因此,作者在书中所做的分析使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进入到一个更深的层次。

作者在书中专门写了“跨国公司与墨西哥经济发展的困境”一章。这里所说的“经济发展困境”实际上就是指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

年代初期,包括墨西哥在内的一些拉美国家出现的“结构性发展危机”。这一危机是由于没有适时转变国家发展战略引起的,具体表现为多方面的结构性失衡,其中最突出的有3点:一是就业需求与创造就业能力的失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业企业快速向资本密集与技术密集的方向发展。二是外贸失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产业升级导致技术、设备等的进口激增;粮食与食品进口的急剧增加则意味着农业部门已不能像过去那样继续为工业发展提供大量外汇支持。三是国际收支失衡。这几种现象在墨西哥都出现了,有的方面甚至比其他拉美国家更为严重。这正是墨西哥等国70年代在国际上大量举借外债的深层背景。作者的分析表明,跨国公司是加剧这种“危机”或“困境”的一个重要因素,或者说,跨国公司在加剧所有这些失衡方面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墨西哥特定的发展模式,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主要是着眼于占领墨西哥的国内市场,因而无须去考虑大量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优势,以低成本的产品去争夺其他国家的市场。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产业链条的主要部分、关键技术以及研发基地都保留在母公司所在国,在墨西哥的投资对当地经济产生的联动效应就相对有限。

五、关于从具体产业部门对跨国公司行为的考察。作者分别以墨西哥汽车工业、制药工业和食品工业作为案例,对跨国公司的行为做了更深层的考察。从中可以看到,尽管跨国公司在这些部门中的行为方式不同,但它们所追求的目标却基本一致,总是力图形成和保持长期的主导地位。食品工业是墨西哥最先发展起来的优势产业,这个产业生产技术和组织管理水平的提高也并非一定通过大量引进外资企业来解决。然而,跨国公司通过参股、并购等方式不断扩展其在食品工业部门的实力,通过广告宣传等手段影响当地居民的消费模式,甚至通过建立新的合成饲料工业改变了墨西哥的作物构成,等等。

作者指出,外国资本在助推墨西哥汽车产业与制药产业的发展上所作的贡献是不容忽略的,特别是在汽车产业方面,墨西哥已成为世界第10大汽车生产国。但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在两大产业中长期保持垄断局

面也造成了一系列的扭曲现象,其中包括墨西哥传统医药业的衰败,这些现象也很值得我们予以关注。这里需要提出的问题是,墨西哥为提高这些产业的“民族化”或“国产化”水平奋斗了数十年,为何成效并不明显呢?我们需要清醒地看到,在一些高新技术产业领域,我们如果真想要实现“民族化”与“国产化”,就必须加速提高自身的科学技术水平,就需要有与这些目标相适应的教育政策、科技政策、人力资源政策,等等,不是单靠外资政策可以做到的。为此,作者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专门就“国家作为技术创新者的表现”进行了研究和论述,指出了墨西哥对跨国公司技术的长期依赖,认为墨西哥国家在技术创新方面是“失败大于成功”。

总之,作者在这部著作中,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原则,对墨西哥与跨国公司关系的历史发展与演变进行了系统的考察与研究。书中对各种相关问题做出精彩、深刻分析的例子甚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作者从这项研究中得出的几点基本看法是颇具启示性的。第一,跨国公司是一把双刃剑,既对墨西哥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也给它带来了不少问题。第二,代表东道国利益的政府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博弈的关系。东道国在博弈中的成败,既取决于双方力量的对比,又取决于国际环境的制约。东道国取得成功的时候,往往既是东道国手中握有王牌,同时又是顺应了国际时势的变化,是谈判双方感到共同利益大于分歧的时候。第三,墨西哥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和经济发展政策的实施有许多失误之处,限制了跨国公司的作用向积极的方向发挥,在某种意义上讲,跨国公司仅仅是经济发展的手段,它的作用只是放大了经济发展战略的效果。

《跨国公司与墨西哥的经济发展》一书的出版,是对我国拉美经济史研究领域做出的一项重要贡献,谨此致贺!

苏振兴

2010 年 3 月于北京

前 言

在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跨国公司作为世界经济运行主体之一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发展中国家东道国应该如何处理与跨国公司的关系?这是两个颇有争议的问题。自由主义理论、依附理论和结构主义理论对此分别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要验证这些观点的虚实真伪则需要有扎实的实证分析。本文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运用历史学 and 经济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方法,着重对1940~1982年墨西哥进口替代工业化期间跨国公司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墨西哥国家如何应对跨国公司的做法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察。

从1940年左右开始,墨西哥经济发展进入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其中经历了三个阶段,即非耐用消费品的进口替代阶段(1940~1955)、耐用消费品的进口替代阶段(1955~1970)、高级进口替代与促进出口相结合的阶段(1970~1982)。跨国公司在第二阶段大量进入了墨西哥的制造业,促进了墨西哥工业化和整个经济的增长,但是伴随“墨西哥奇迹”到来的同时,一系列结构性问题也为后来发生的危机埋下了伏笔。由于受墨西哥革命和1917年国家宪法的影响,墨西哥政府对外国资本始终采取了利用和限制相结合的政策,但在不同时期侧重点不同,掌握政策的松紧程度也不同。对采掘业和公用设施、基础工业,墨西哥政府坚持国有化方针,对制造业则采取“墨西哥化”和生产“一体化”方针。在前两个阶段(特别是第二阶段)外资政策比较宽松,在第三阶段则加强了对跨国

公司的管制。墨西哥国家在与跨国公司的博弈中同时扮演了企业所有者、政策管制者、制成品出口推动者、技术创新者、财政金融经营者等多种角色,其中有些基本是成功的,国家保持了主权独立,并能将外国直接投资引入需要发展的产业和地区。但在倡导技术创新和实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方面最终是失败大于成功,这成为导致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

与东亚国家(地区)相比,墨西哥在利用跨国公司方面存在失误,因为从宏观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看,跨国公司没有促使墨西哥当地资源比较优势得到充分利用;从微观资源配置效率看,跨国公司没有促使当地企业的成长和增强其竞争力,尽管跨国公司促进了墨西哥制造业的结构效率,但这种促进是通过跨国公司进入制造业的“现代”部门来实现的,而对整个行业的技术进步率和“传统”部门则没有影响;从产业关联效应的角度看,跨国公司产业链条的主要部分在国外,关键技术也在国外,对当地经济产生的联动效应很小。相反,跨国公司在东亚国家(地区)利用了当地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并促进了当地企业的成长和升级。这种跨国公司作用的区别不仅取决于两地政府谈判能力的区别,而且取决于两地发展战略的差异,而发展战略则是由国内和国外多种因素决定的。

通过对 1940~1982 年跨国公司与墨西哥经济发展进程的研究,可以归纳出这样几条结论:

第一,跨国公司对墨西哥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包括资本积累贡献、税收贡献、就业贡献、技术贡献、出口贡献等,但跨国公司是一把双刃剑,它也给墨西哥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少问题,如在第三章和第六至第八章案例分析中提到的东道国制造业的“非民族化”、国际收支逆差、地区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强技术依附、改变东道国市场结构、干预东道国政治进程等等。跨国公司与 1982 年债务危机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与东亚国家(地区)相比,跨国公司在东亚国家(地区)发挥了更大的积极作用,而在墨西哥则基本没有发生像在东亚国家(地区)所产生的那种经济扩散效应。

第二,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代表东道国利益的政府与跨国公司之间

的关系可以被看作一种博弈关系,因为二者追求的战略目标有很大差异,东道国可以与跨国公司讨价还价,通过各种政策手段引导和管理跨国公司的行为。墨西哥汽车工业、制药工业和食品工业的案例分析表明:当东道国政策与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在大方向上基本一致的时候,跨国公司就会做出很多改进或让步,当东道国政策目标与跨国公司战略发生冲突的时候,外国企业就会忽视东道国的政策目标,采取一种捍卫现状的立场。在与跨国公司的较量中,东道国如果采取积极主动的姿态,很有希望获得成功。东道国在博弈中的成败,既取决于双方力量的对比,又取决于国际环境的制约。东道国取得成功的时候,往往既是东道国手中握有王牌,同时又是顺应了国际时势的变化、使谈判双方感到共同利益大于分歧的时候。

第三,在经济发展进程中,跨国公司作用的性质一方面取决于跨国公司本身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性和它的全球经营战略,另一方面取决于东道国国家的谈判能力、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与东亚国家(地区)的比较表明,墨西哥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和经济发展政策的实施有许多失误之处,它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政策限制了跨国公司作用向积极方向发挥,在某种意义上讲,跨国公司仅仅是经济发展的手段,它的作用只是放大了经济发展战略的效果。当然,一个国家选择这样的发展战略而没有选择那样的发展战略,往往不是主观因素就能够决定的,它要受到多方面客观条件的制约,国家作用只能在一定的制约框架之内发挥主观能动性。但这样说并不是宿命论,而是想强调,国家决策者应该在尊重历史、顺应时势的前提下,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因势利导,趋利避害,使跨国公司为我所用,而不是受制于人。

Preface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as one of the main world economic entities is playing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world of increasing economic globalization. What roles do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play in the economy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How should the host developing countries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with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These are two controversial questions to which Liberalism, Dependency Analysis and Structuralism have given different views. The verification of these opinions requires solid positivistic analysis. This paper combines historical method and economic method to study in details the effects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on the economy of Mexico and the reaction of Mexican state to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during the import – substitution industrialization period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from 1940 to 1982.

Around 1940,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exico entered a period of import substitution industrialization, which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namely the non – durable consumer goods import substitution phase (1940 – 1955), durable consumer goods import substitution phase (1955 – 1970), advanced import substitution and export promotion combination phase (1970 – 1982). A large number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entered Mexico'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promoting 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growth of the whole economy of Mexico during the second phase. However, with the arrival of "

Mexican miracle", a series of structural problems that foreshadowed the subsequent crises emerged. Influenced by Mexican revolution and the 1917 Constitution, the Government of Mexico has taken a combined policy both utilizing and limiting foreign capital with different focus and degree of tightness at different points in time. For extractive industries, public facilities, and basic industries, the Mexican government stuck to the principle of nationalization, while for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t adopted Mexicanization and production integration approaches. During the first and second phase (especially the second phase), the foreign investment policies were quite loose; in the third phase, the control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was strengthened. Mexican State played multiple roles in the game with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including business owners, policy controller, promoter of manufacture exports, technological innovator, and fiscal and financial operators, some of which were basically successful, maintaining the country's sovereignty independence and directly introducing foreign investment to the industries and regions that need development. However, in advoca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fiscal policy and monetary policy, failure overshadowed success eventually. This became an important cause of the debt crisis.

Compared with East Asian countries (regions), the use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Mexico has flaws. From the view of the efficiency of macro resource allocatio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Mexico did not contribute to the full utilization of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local resources; from the view of the efficiency of micro resource allocatio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did not promote the growth of local businesses nor enhance their competitiveness. Even though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improved the structural efficiency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is improvement was achieved by the entrance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into the "modern" departments of the industry without affecting the "traditional" departments and the technology progress rate of